

## 纪念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五十周年

# 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年

钱 临 照

### 一、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前

#### 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活动

中国有物理学之称,始于十九世纪之末.由于列强欺压和政府的腐败,物理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在艰难条件之下,经过当时物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才获得缓慢的发展.到1930年左右,高等院校设物理系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厦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和云南大学等二十多所.这些大学中的物理系除物理教学外,也有若干个大学象北大、清华、浙大、中大、燕京等开展物理学研究.1928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于上海;1929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于北平.总的说来,在1930年左右,估计当时的物理学工作者约在三百左右.

物理学的基础在于实验,1920年以前,我国大学虽有物理学课程,但只有讲课.自胡刚复、颜任光从美国回来之后,分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开始在两校建立物理实验室,从此我国物理教学走上正轨.当时有南胡北颜之誉.请允许我在这里根据我接触和记忆到的写出早期在国内领导和组织我国物理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若干物理学者,其中有夏元璠、魏嗣銮、何育杰、李耀邦、颜任光、温毓庆、胡刚复、李书华、张貽惠、文元模、叶企孙、丁燮林、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守竞、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张绍忠、束星北、魏学仁、桂质廷、谢

玉铭、丁绪宝、卞彭、孙国封、徐仁铎、康桂清、朱物华、方光祈、祁开智、查谦、涂羽卿、杨肇熾、龙际云、阮志明等.他们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之前或从事于物理学的教学工作,或在中国国土上开展第一批物理研究工作,或因陋就简制作物理仪器,推动了我国物理学的进展.他们在物理学的发展中可以称之为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拓荒者.这些人现在大半已不在了,健在的也到了大耄之年.在纪念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物理学开创时期作出的功绩.

### 二、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1932年)

1931年设在瑞士的国际联盟派了四位专家来考察中国的教育.其中一位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保尔·郎之万,他的来到受到我国物理学家的热烈欢迎.他曾应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邀请,作学术报告,还南去杭州,在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报告.就在一次北平的物理学者欢迎他的宴会上,郎之万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他还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应加入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学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和国际上的物理学工作者互通声气.由于在此之前中国物理学的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经过郎之万的促进,迅速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推选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经过广泛协商,着力筹备,于1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假清华大学召开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亦就是第一届中国物理学会年会.领导会务进行工作的是理事会.

按照成立大会通过的会章,领导中国物理学会的是理事会,理事会又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历届理事会的主要负责人见《中国物理学会的若干历史资料》一文<sup>1)</sup>,这里不再重复。会长、副会长等职称以后有数次变更,如改称理事长、副理事长等,但职责一仍其旧。历届曾任理事长的有李书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现任的理事长为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的会务是通过年会的活动和四个专门组织来开展的。在学会成立之初就设有学报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教学委员会三个专门组织。抗战胜利之后又添设应用物理汇刊委员会。这些组织除最后一个委员会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它三个专门委员会,尤其学报和名词审查两委员会的工作赓续至今已经五十年。

### 三、初期的发展(1932—1936年)

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之后,第二次年会于193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会上宣读论文。1934年的第三次年会在南京召开,1935年的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那时山东大学在青岛)举行。1936年第五次年会于北平举行。在阴云密布、暴风雨来袭之前夕,年会还是一年一次,抗日战争前共开了五次。

为了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报在1933年至1935年出版第一卷第一、二、三期,1936年出版第二卷第一期。第一、第二卷的主编(当时称干事)为严济慈、丁燮林,其他编委有张贻惠、张绍忠、周培源、胡刚复、王守竞、吴有训、饶毓泰等人。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报用外文(英、法、德三种)发表,附以中文摘要。自1933年到1936年主编没有易人,编委略有更动。

我们的物理学会工作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物理学会成立后推举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饶毓泰、张贻惠为译名委员会委员,加上数

理学会推出之叶企孙、吴有训在北京开会讨论多次。同时,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会员也进行此项工作。

1933年春日寇入侵古北口,威胁北平。当时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一部分南迁到上海。当年夏天清华大学一部分教员在上海休假,于是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就在当时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旧址开展工作,这是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的第一次。与会者就我记忆有何育杰、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杨肇熹等八、九人。时方盛夏,挥扇座谈,对每一物理名词思索最恰当的中文译法,各抒己见,融洽无间。这次名词审查的结果于1934年印书公布,这是我国物理学名词审定公布的第一次,以后这个委员会继续工作至今不断。

在这一段时期物理学会就度量衡和大、小数命名提出建议。1934年《东方杂志》有一专号登载这方面的论战。物理学会提出的建议为当时科学界所采纳。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怒潮,当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情十分沉重。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王守竞、丁燮林等老一辈物理学家思索着如何发展物理学中应用物理分支学科,培养青年一代为国输材。当时中央研究院开展了物理仪器制造工作,北平研究院开展了应用光学及压电晶体的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磨玻璃技术。他们还引导、鼓励一批当时的出国青年学习应用光学、物理冶金、弹道学、流体力学、声学、气象学、无线电、地球物理、光弹性物理、海洋物理等,这些人现在是各该分支学科的创业者和得力的领导人。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中国物理工作者的学术活动,导致1934年朗缪尔(Langmuir)、1935年狄喇克和1937年玻尔的相继访问中国,他们在北平、上海等地的学术活动加深了中国物理工作者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1) 见本刊今年第5期第311页。

#### 四、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寇突然在芦沟桥发起战争,北平、天津以及华北各大城市相继为日寇所侵占。平、津两大城市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在这种政治形势突然变化之下仓促南迁。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各地区的学术机构亦纷纷西迁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等地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大部分师生经过长途的步行抵达昆明,联合起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迁到重庆郊区沙坪坝,武汉大学迁到峨眉山下乐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先经香港迁昆明,继迁桂林,复迁北碚。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入昆明黑龙潭。他们跋涉千里历尽艰险终于找到暂且安身之处。有的在搬迁过程中经历二、三年方始到达略可安顿的地方。浙江大学在抗战中的经历最为艰苦,浙大在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的领导下,于1937年11月自杭州出发西迁,历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辗转跋涉五千里,最后于1940年2月抵贵州遵义、湄潭建立新校址。他们每到一地,就在会馆、庙宇里甚至在野地上上课,在庙宇的神台上摆出实验仪器,让学生进行实验课,遇上敌机空袭,就分散到田野或树林里躲避,当发现敌人在逼近时,则再一次收拾书籍及仪器设备匆匆西行。这样历时二年三个月,浙大就象一支坚强的打不烂的军队,辗转数千里,一面行军一面教学。内迁的各学术机构,其艰难困苦的情况大都类此。

在这种学术机构纷纷西迁之中,有若干物理学工作者或学生(如于光远、韩天石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还有一部分物理系师生在平津撤退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留在附近,利用他们的业务知识进行炸药武器的制造,输送给游击队,打击日寇<sup>1)</sup>。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不能西迁的物理学工作者,他们中绝大多数困守危城,在接济已断,生活困顿,甚至贫病交加时始终不为敌诱。

物理

所有上述这些物理学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1939年至1944年物理学年会共开了六次。由于当时在抗战之中,会员分处各省,交通不便,因此从1942年起年会分散在各地区举行。例如1942年和1943年的年会分别在昆明、重庆、西川、西北、贵州、桂林等六个地区举行。1942年是牛顿诞生三百周年,是年在重庆和贵州的物理学工作者分别举行牛顿三百周年诞辰纪念会。1942年正是抗战处在最艰苦的时期,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在频遭敌机轰炸的重庆和地处僻壤的贵州,还能聚首一处,开会作报告纪念牛顿,这种追思前贤,探索学问的精神可称难能。

1937年学报出版至第三卷第一期,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停顿二年,至1939年又开始续出第三卷第二期,但至1940年第四卷第一期出版之后,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再次停顿。直到1944年开始继续出版第五卷第一期与第二期,1945年出版第六卷第一期,抗战八年之中,共得六期学报。从表面上看这后三期学报用的是粗糙的土纸,印刷质量低劣,但是这里却凝结着不少人的心血。特别应当提到,1941年后,原来承印学报的印刷厂不能继续承印了。正在为难时刻,在成都华西大学执教的我会会员李珩在成都找到一家小印刷厂,愿意承担印刷。但是,那时学报委员会的委员以及负责学报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都在昆明,办理这些工作有困难,李珩却积极主动一人负担起定稿、校对、出版、发行的一切琐碎而繁忙的工作,克服了印刷中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困难,那两年的物理学报才得以继续出版和读者见面。

#### 五、解放以后的中国物理学会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欢欣鼓舞,心情舒畅,大家一个心愿要奋发图强。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原物理学会的领导人留下来。在解放战争之中有一批物理系学生参加了学生运动,还

1) 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有一部分到解放区去了，更多的物理系师生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斗争，解放后他们又会合了。与此同时原在国外的中国物理学者周培源、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余瑞璜、王大珩、葛庭燧、胡宁、黄昆、朱光亚等联袂归来。年长的和年轻的全国物理学工作者有个共同的心愿，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为新中国的物理事业作出一番贡献。

1949年7月在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上物理学家被选为常务委员的有严济慈、叶企孙、钱三强、钱伟长、吴有训等。接着在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及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会议中被选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有本会会员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和钱三强四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共同纲领所指出的方向，使物理学工作者觉得旧的物理学会会章不适应这个要求，有更改的必要，并推举五人起草本会的新会章。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物理学会25人参加，这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促成了1951年8月召开全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1951年8月11日至17日第一届物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各地区到会的会员代表59人，列席代表16人，他们代表了全国20个分会共1226位会员。这次会议标志着在全国解放新形势下物理学事业的变化。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周培源致开幕词，开幕词指出，物理学工作者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才能翻身，物理学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思想。过去学会只局限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是不够的，没有注意中学物理学教育以及忽视应用和普及工作是不合新时代要求的。为此，在那次代表大会上邀请于光远作“物理学工作者怎样为祖国服务与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的报告，邀请葛庭燧、施汝为、程开甲、陆学善、龚祖同等人作专题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强调，物理学在生产与国防上的应用）。大会又邀请王振铎作“关于古代中国物理学的伟大成就”的报告，激发物理学工作者的爱国热忱。上述报告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物理学工作者的今后工作提出了新的学习和工作方向，鼓舞了新中国青年一代物理学工作者努力前进。为了改革物理教学工作，物理学工作者在代表大会之前已分头热烈讨论改革的方案，就在那次大会上把物理教学讨论做了个总结。总结中不但提到大学物理教学，也注意到中学物理教学的改革。这是物理学会以前未注意到的问题。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新会章。新会章中物理学会的宗旨是“为在团结全国物理学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工作经验，谋物理学知识之普及、提高与应用，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经济及国防建设服务。”这样明白地把物理学会会员的工作纳入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去。从此，物理学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于新中国。会议选举出理事会理事二十一人，并从中选举九人为常务理事。理事长周培源，副理事长钱三强，秘书陆学善，会计毛鹤龄。在新的理事会的领导下，物理学报继续出版，发表论文，以中文为主，附外文摘要。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加紧进行。除此之外，出版物理通报，它的目的是“帮助改进中学和大学物理教学，阐明物理学和实际的联系，加强物理学的应用，以使物理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5—1957年又从美国、欧洲回来一批物理学家，加强了国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63年8月19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209人，全国除西藏、台湾省外，各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是一次全国物理学工作者团结的大会。会上周培源致了开幕词并作了会章修改的说明报告，施汝为作了年会筹备工作报告和会务工作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新会章。学术活动是本届大会的主要内容。大会共收到论文325篇，宣读了134篇。特邀的21篇报告中有的介绍了目

前物理学一部分领域的概况，有的扼要报道了十年来我国物理学工作在某一领域内的成就。在教学方面有10位同志提出了论文或作了特邀发言，介绍了经验，会议选举了新的全国理事会，选出了理事75人，其中常务理事21人，并推选周培源为理事长，钱三强、施汝为、王竹溪为副理事长，丁西林、胡刚复、颜任光、饶毓泰为名誉理事。会议在钱三强致闭幕词后胜利闭幕。

这次年会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期间，物理学会进行的主要工作为：(1)汇总了会员名单计3320名并付印成册。(2)对年会部分论文进行征集和汇编。(3)1964年夏接待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等，1966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的物理讨论会。(4)继续出版“物理学报”、“声学学报”、“物理通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会工作中断，学术刊物停刊。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物理学会恢复工作，并于1978年8月1日至15日在庐山召开了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这次年会的规模是空前的，是物理学界的一次盛会。年会与会代表共602人。会上周培源致了开幕词，钱三强作了报告，王竹溪作了关于修改会章的报告。会议中召开了物理学会理事会，原则通过了“中国物理学会章程”，调整了理事会。新理事会共151名理事，其中常务理事34名。理事会推选周培源为理事长，钱三强、施汝为、王竹溪、甘柏、王淦昌、张文裕、汪德昭、谢希德(女)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由施汝为兼任，副秘书长为管惟炎、朱洪元、沈克琦、徐叙瑗、周光召、何祚庥、李寿枏。这就是现在物理学会的领导机构。

年会期间分别举行了固体物理、核物理、基本粒子、统计物理学术报告会，年会共宣读318篇论文，其中综述报告64篇。

年会要求：1.开展学术活动，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2.办好学术刊物，3.大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4.加强学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

年会在施汝为致闭幕词后胜利结束。

总起来看解放之后，物理学事业获得了迅

速的发展。物理学的各分支学科都有众多的人员在工作。因此，物理学会的组织不能不作相应的变更，特别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学会工作发展迅速。现在属于物理学会的分支专业学会有高能物理学会、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光学学会、声学学会、电子显微学会、核物理学会、液晶学会、质谱学会、粒子加速器学会，还有静电、波谱、内耗与超声衰减、原子分子物理、电介质、光散射、相图、现代物理光学等八个专业委员会。每年有众多的各种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例如1981年就有42次，分在全国各地举行。

物理学会的刊物亦有发展。物理学报从1951年继续出版以来，到1959年第十五卷起已能由季刊、双月刊改为月刊。1966年7月至1973年12月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停刊七年半。1974年复刊以来，初为双月刊，1981年改为月刊。1974年的编辑委员会有26人，主编王竹溪，副主编为朱洪元、管惟炎、李荫远。1979年副主编中朱洪元已任《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主编，不再担任此职，1980年增加谢希德为副主编。

物理学报自1932年创刊以来，历经五十年，共刊出三十一卷。其间因故停刊数次，但最终还能继续出版。每卷的期数，从过去每年只出一期或二期到现在每月一期，篇幅也大大增加。

物理学会的刊物在解放之后，除《物理学报》外，1951年—1966年出版《物理通报》，1954—1958年又增添《物理译报》。译报以介绍苏联的物理科研成就为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术刊物停刊，1972年《物理》创刊，这是一个物理学方面的综合性刊物。介绍物理学知识及其应用并刊登研究简报并报道物理学界动态。1964年开始出版的《声学学报》于1979年复刊。在此期间，《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于1977年创刊，《原子核物理》和《低温物理》于1979年创刊，《半导体学报》和《质谱学报》于1980年创刊，《物理学进展》于1981年创刊，《电子显微学报》于1982年创刊，同时还创刊了教学方面

的刊物《物理教学》、《大学物理》等。据现在统计，归物理学会及其专业分会所编辑的刊物共12种。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刊物编辑室和学会办公室的工作是十分琐碎繁忙的，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一贯勤奋工作多年的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学会工作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物理学报》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注意。从三十年代起，我们《物理学报》的论文摘要就被美国的《物理文摘》收入。1981年起由美国的物理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出面组织，选择我国《物理学报》、《物理》、《天文学报》、《天体物理学报》、《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原子核物理》、《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激光》、《光学学报》、《低温物理》、《半导体学报》和《声学学报》等学报所载论文，出版名为《中国物理》(Chinese Physics)的刊物。编辑委员会十人委员中有杨振宁等六人是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物理学会的会员对近代物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或者在当时起过领先作用，或者至今仍然是在做有影响的工作。其中有李耀邦1914年以密立根方法利用固体球粒测定 $e$ 值，胡刚复对X射线放射机制和对原子结构的推测，叶企孙对普朗克常数的精确测定，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系统测定，严济慈关于压电晶体和光谱学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研究，赵忠尧的硬 $\gamma$ 射线的反常吸收的研究对正电子的发现起了有益的作用，王守竞于1927年以量子力学的概念研究氢分子的问题，任之恭作微波研究，吴大猷关于分子光谱的研究，王淦昌于四十年代初期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钱三强、何泽慧首次证明铀的三分裂及四分裂现象，张文裕关于 $\mu$ 介子( $\mu$  mesic atom)的发现和 $\mu$ 介子的非强作用的直接证明的研究，胡宁、朱洪元、周光召等关于基本粒子的研究，彭桓武对介子理论和宇宙线理论的研究，黄昆的晶格动力学研究，萨本栋关于电路分析的研究，王竹溪、张宗燧关于统计物理的研究以及葛庭燧关于内耗的研究等等。

解放以来，除了继续发展已有的物理学科分支以外，还创建了半导体物理、激光物理、低温物理、高压物理、水声学、空间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生物物理、非晶态物理、表面物理等等新的物理学科分支。特别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一大批物理学会会员积极参加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更多的会员在物理学科研究和教学岗位上辛勤劳动多年，使我国的物理学事业不断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支规模较大的物理学队伍，其中有仍在指导工作的老一辈物理学家，有在各个领域起着继往开来的骨干作用的广大中年物理学工作者，还有正在迅速成长的青年物理学工作者。他们分布在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声学研究所、合肥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合肥固体物理研究所、长春物理研究所、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西南物理研究所、武汉物理研究所及其它同物理学有关的研究机构中。他们还分布在北大、清华、北师大、复旦、南京、南开、吉林、兰州、中山、四川、武汉、山东、浙大、厦大、云大、中国科技大学和其它许多大学之中。还有更多的会员分布在中学担任育苗的工作。回顾五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使我们对中国物理学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中国物理学家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草创中国的物理学事业而流下的汗水和历尽的艰辛，是永远值得回忆和怀想的，正是在这种历尽艰辛而却卓有成效的中国的早期物理教育和研究中，才能找到一批活跃(或曾活跃)在国外的物理学家的“根”，他们之中有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任之恭、范绪筠、吴健雄、袁家骝、林家翘、黄授书、黄克逊等人。

解放之后，中国的物理学开始受到学习苏联这—倾向的较强的影响。特别是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大学物理学教学全面地吸取苏联的大纲和教材。苏联的教材具有严谨、系统、重理论的特色。在五十年代中国培养

出的物理学工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这种吸取所起的作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就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成立大会后不久，就推举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P. Langevin)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会员。到1948年9月底为止，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国外物理学家有印度的喇曼(C. V. Raman)，美国的密立根(R. A. Millikan)、康普顿兄弟(K. T. Compton, A. H. Compton)，英国的布拉凯特(P. M. S. Blackett)、布喇格(W. L. Bragg)、狄喇克(P. A. M. Dirac)，法国的卡巴纳(J. Cabannes)、约里奥·居里(F. Joliot-Curie)。解放后，为了加强中苏两国物理学界的交流，总会的理事会在1949年9月25日举行的第83次会议中作出决议，聘请苏联的瓦维诺夫(С. И. Вавилов)、约飞(А. Ф. Иоффе)和斯柯伯耳琴(Д. В. Скобелъцын)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会员。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为首的十五位日本物理学者首次来华。六十年代，我国物理学家和国际同行间的来往较少。其中重要的有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阿·玻尔前来访问和讲学。1977年以后我国物理学家和国际同行间的来往逐年增多。物理学的各分支学科的国际会议也有在我国召开的。例如，1980年在广东从化召开的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美国、西德、瑞士、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华裔科学家参加。

1982年第三次格鲁斯曼广义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在上海召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任之恭等，从1971年以来多次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关心和帮助我国物理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此我们对他们和其它外国物理学界友好同行表示感谢。

中国物理学会已经历了五十个年头。如上所述在前十八年中，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在内忧外患、战火纷飞的困境中度过。他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团结一致，勤奋工作，努力探索发展中国物理学的道路。在后三十二年里，中国物理学会逐渐发挥它对建设新中国的作用。在教学、科研、生产和国防建设上物理学工作者各尽所能，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作出不少成绩。在国际学术界也建立起我们应有的地位。这些都是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物理学工作者努力所获得的成果。我们中国物理学工作者今天追述过去，展望未来，满怀着激情，相信在第二个五十周年的时候将以十倍、百倍的好成绩向读者汇报。

本文受了《物理》编辑部的敦促和支持而勉为其难地写成的。稿成之后，得到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张文裕、管惟炎等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后在文字上得到吴自勤、方励之两位同志的修饰，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文中所述如有不符事实或疏漏之处，概由笔者自负。

## 我对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先生的点滴回忆

钱 三 强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已五十年了。回想起物理学会成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理预科作学生。那时马神庙北大理学院里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有什么学术报告都可以去听；本科的课，预科的学生也可坐在后面旁听，我当时也是时常去听本科的课的。当时，我本来想学电机工程，但听

了物理系的本科的课程以后，我的兴趣渐渐转向了物理。

物理系课程除了本校教师教以外，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吴有训先生和萨本栋先生也到北大兼授近代物理和电磁学。他们讲课口齿清楚（虽然吴先生的江西口音听起来不太习惯），